

从特区到大湾区：深圳小说的初速度与加速度

□申霞艳



年轻的现代都市

诗人艾青来深圳时曾激动地写下：“这里是年轻的特区，年轻的城，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人。”青春的一切充满希望，让人神往。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通过对全球城市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个城市的尊严，通过尽可能远地脱离土地的束缚而获得。城市开始尝试将天堂里的秩序和尊严带到人间，通过切断其农业根基，驯服寒冬，变夜为昼，以及约束感性的人体以拓展脑力来实现。“脱离土地的束缚”对于我们理解深圳的现代性及其文学的新质非常有裨益。“乡土中国”的命名深入人心，乡土文学的成就璀璨夺目，甚至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的标准依然基于乡土性。农业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价值标准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也由此有自。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每个城市都从她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前身为小渔村的深圳有着与世界绝大多数城市不同的生长背景和发展轨迹，海洋的浩瀚、神秘、联通也决定了深圳的城市气质。从人口比例和城市空间来看，特区与乡村的关联相对微弱。短短四十几年，深圳的人口增长了六七十倍，由三十几万人增长到近两千万；面积扩大了6倍多，财富涨幅惊人，人均GDP居全国首位，城乡一体化程度很高，由前现代的海边小村落发展为以高科技为主的国际都市。这不仅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奇迹，也让整个世界瞩目。20世纪之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城市能够脱离与农村的血脉关联，遑论中国。

北上广深，前三者都有着悠长的乡土发展史，而深圳独树一帜，受传统束缚较小，其最大的文化特征是“在路上”，是变、流动、矛盾、无序、新思想和未来性。变成成为，每天睁开双眼，面对的是由小变大和大变组成的包含漩涡、暗礁的时光河流，新意味着速度、挑战与激情。土著的比例极小，所以客家话并不占多大优势，夹杂方言的普通话成了代表性语言。语言并不仅仅是思想的媒介，更与个人的自我认同息息相关。不同语言的相互刺激，语言的活跃度亦反映情绪、思想和文化的丰富程度。

21世纪，我们正处在智能文明与印刷文明交替的历史时段，年轻的深圳，荟萃着科技的弄潮儿，腾讯、华为等高端企业引领科技风尚。作为与时代、自我对话的利器，文学会呈现文明交锋的异质性，也展示地域文化的寻梦气质。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处在多文化激烈的磋商与撞击中。毗邻的香港乃深圳发展的重要镜像，省府广州亦是一重参照。五湖四海甚至全球的外来者各自携带着自己的梦、欲望和习俗汇聚于此。色彩斑斓的跨文化交际、多种多样的生活世界与隐含着现代观念交融、互换，刺激深圳文学的审美特质发育。

特区：寻梦

特区的构想集中了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未来的眺望，“特”表现为特殊的身份，专门的通行证。改革开放在这片试验田上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改革故事。作家们听从时代的召唤，拿起自己的笔，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梁崇山的《鹏回首》分别以招商引资的领导袁庚和市委书记朱荣海为原型，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勇敢者，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探索蛇口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批作品展现了特区初创期尖锐的观念冲突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歌颂改革先锋的魄力、担当和勇于探索的“拓荒牛”精神。这种具

南方多才子，我曾经把赵柏田先生划为南方写作的代表。他笔下叙事的轻灵，或许准确说，卡尔维诺意义上的叙述上的轻逸，让他处理任何题材都显得举重若轻，能给予读者感官与智性的双重满足。

有幸从上世纪90年代就和他有编读往来，也算对他的创作旅程有了一路的见证。在我初到北京，在一家报纸的副刊做编辑时，那时尚在宁波的柏田老师成为我的作者。他那时写了大量读书随笔，这在他后来结集出版的读书评论集《双重火焰》中也得到了印证。山野千鹤子曾经评价一种评论文字，“是与自己受到吸引的、灵魂被紧紧抓住的对象进行斗争，并为了跟他说再见而写作……是一种使用他者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拐弯抹角的形式”。柏田先生的读书随笔，我认为就是这一类。阅读也是和高手切磋技艺与方法。柏田先生是非常注重写作方法论的作家。对标的是这个类型领域的高手：我们能从他一路写作中，一一认出背后的影响：史景迁、魏斐德、盖伊·特立斯、尤瑟纳尔，或者还有卡尔维诺……

柏田先生醉心于历史中人，他的《让良知自由——王阳明的自画像》，是诗性的笔触书写的先哲的心灵史，而《南华录》这本书今年又以《极致审美：晚明南方士人风雅录》的书名再次递到我的手上，又是我每次看完古代文人书画展，都会重新翻阅的书。古物与人的关系，这几年著述变多，但柏田先生的古物，更像是文化与文人的变身。其间的精细优美与欢喜苍凉，浸润于他的笔尖，这类文本天然和柏田老师的文字气质合拍，让他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汉语优雅的魅力。

谈《银魂》（浙江文艺出版社）之前先梳理这些，是想说柏田老师其实是写作的多面手。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后面的作品，提供认知与资料的储备。当他近些年把题材，切入到近代中国的转型时，这些优势就迸发出来。从《赫德的情人》开始的一系列后续，他能带着问题意识，展开多维度叩问。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个片面：从制度的建立，到人心的拷问。在革命与资本的复杂纠缠，再到《银魂》，一群银行家在世纪变局中的载沉载浮。主人公是张嘉璈，自然也带出近代中国银行家的群像。柏田先生尤其让人注意到，张嘉璈与他的同行身上所体现的权力与商业道德的博弈，他们的责任、使命与理想挫败，在当今这个时代，仍然让人对照警醒。

从《枪炮与货币》到《银魂》，虽然都是民国银行家的事，但这并不是内容上再做深填的递进文本，里面显现了一种转向，是更严谨小心地在面对材料，使之不因叙述者的有限理解而走形，同时，他又不再规避那些属于银行家的、多少有些需要用枯燥数字说话的文獻资料，并在这资料罅隙中，找到叙述的节奏与呼吸。那种对人

有历史纵深感与鲜明思想解放特色的力作形成深圳特色的新主流文艺。

诸多外来者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书写打工文学，这个命名虽然包含一种身份的等级制，但亦保留了城市化刚开启、历史过渡阶段的特色，见证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1984年，林坚的《深夜，在海边有一个人》发表，被视为第一篇“打工小说”。1988年，以打工文学为标志的《大鹏湾》创刊。1992年，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被称为“五个火枪手”，他们都以“我手写我口”的业余写作，将身为打工者在流水线“城中村”中的辛酸与孤独、冷遇与歧视、收获与心声一一细数。人、财、物急剧流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随着打工群体队伍的扩大，打工文学逐渐产生了一批代表性作家作品，如盛可以的《北妹》《水乳》、王十月的《国家订单》等成为潮流中的亮点。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让底层文学步入历史前台，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后来双雪涛、班宇等新东北作家群关注的国企改革问题一脉相承。

随着户籍制度和人才流通机制的变化，打工与工作的区别日渐缩小，同时价值观也随之松动。连续剧《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播出，让这个开放而时尚的新价值被广为传播，给外来的奋斗者以深深的鼓舞。虽然一千万个外来者携带着一千万个不同的梦，但相同的是他们都为梦想而来。深圳街区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大湾区定期举办交流活动，街区的民刊将广大文学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这些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给深圳文学提供了沃土，荟萃了像杨争光、邓一光、曹征路、南翔、吴君、盛可以、旧海棠、蔡东、陈再见、厚圃等不同年龄不同资历的写作者，原乡文化与在地文化的磋商、交汇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中。他们不仅自身努力从事创作，而且为繁荣深圳文学，营造多元对话的文学氛围创造条件，促进文学观念的升级迭代。深圳文学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最有力的注释。

大湾区：再出发

早期的本土/外来的二元对立的身份冲突与认同问题开始细化、具体化，“新城市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深圳文学进入新阶段，越来越多佳作于大刊发表，而且长篇佳作数量激增。看似偶合实为契肌，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提出，让深圳的文学创作生机蔚然，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叙事体量都展示了惊人的爆发力。

呈现度、辨识度以及作家对都市的融入感逐步加强，深圳二字成为小说标题中的高频词汇，这在其他城市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比如邓一光的《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 27'—22° 52'》，吴君的《亲爱的深圳》、毕亮的《在深圳》、丁力的《深圳故事》等作不仅将深圳作为叙事题材、空间，且让题眼“深圳”充满魔力。借助于文学的传播，崭新的都市景观如市民中心、万象城等各种地标就像名牌的logo一样熠熠发光，给读者以与乡土文学中的草木风物全然不同的权力想象。

深圳给了不同年龄的人再出发的勇气，让青年作家开启寻梦之旅，令资深作家重返少年想象。邓一光乃深圳巨变的镜子，他有博物学的兴趣，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以60多个中短篇讲述一个立体而饱满的深圳。77万字的长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将深圳文学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小说深入历史腹地，从现代性的纷争、矛盾与合力中寻求大湾区的根基，在全球史视野的烛照下，非虚构的文獻与虚构的人物、细节和独

特的地方性知识融汇成饱满的历史感，深圳得以与广阔的时空联系起来。同时超越语言的音乐旋律氤氲出空灵之境。主人公郁漱石丰富的心灵与钟情于诗的日瓦戈医生精神相通，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人物形象。

从中篇《皇后大道》到长篇《万福》、新作《同乐街》，吴君以矢志不渝的书写成为“深圳文学地理的测绘者”。早期她关注外来者，后来注重彰显深圳、香港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同乐街》尝试将家族、代际、性别、外来者与本地人、领导与居民、深圳与香港等诸多矛盾融入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的过程中，致力于呈现高速度发展背后深圳本土人及后代面临的窘境。不同于很多对城市持批判态度的作家，吴君心中一直潜藏着“万福”“同乐”的梦想，努力构建我们共同体，凝练地域记忆，渴望抵达一种同舟共济、美美与共的诗意愿景。

即便坚持乡土书写的作家杨争光亦认为深圳像望远镜“给了我距离和另外一双眼睛”，从《少年张冲六章》到新作《我的岁月静好》都显示了一种经过现代洗礼的叙事距离。南翔的《绿皮车》《伯爵猫》等小说集展现了对传统伦理的缅怀和脱轨者的恻隐之情，他的“三个打通”及其艺术实践亦给读者较深的启迪。毕亮不温不火的叙事态度和对短篇小说的情有独钟让人印象深刻。陈再见的“湖村”系列和县城故事也具有不同于田园牧歌的现代特征，新旧夹杂常常让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界面气质。旧海棠的自传体长篇《消失的名字》通过姐姐的病故细致地呈现特区深圳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骨肉相连，“诗与远方”的背后是泪水和血，小说以一个家庭内部的变故痛悼渐行渐远的故土与亲情。

尤为可喜的是，林棹和厚圃以非凡的叙事抱负和开拓者的勇气创作出《潮汐图》和《拖神》，他们的叙事努力打破二元对立，重建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联结。新作《潮汐图》延续了《流溪》卓越的语言驾驭力和想象力，以一只诞生于清末的雌性巨蛙在广州、澳门、“西方”的游历为叙事纵轴，呈现全球史视野下大湾区的现代转型，叙事将粤方言、国语官话与竹枝词及翻译腔结合，创造出五彩斑斓的多重奏，得到了诸多赞誉和广泛的回应。厚圃以非凡的叙事耐心和雄心创作长篇《拖神》，小说塑造了典型形象陈鹤寿，确立商业文化的正面价值。小说中人语、神语与鬼语并置，单章呈现水流神、三山国王、天妃娘娘等神话，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呈现富族和宦家不同生活方式及其不同的信仰。双章是陈鹤寿的生命史与奋斗史，建设樟树埠的英雄传奇被放置于19世纪近代转型的大历史中，他背负着近代中国的幽暗、屈辱和创伤，但他勇于开拓，心态开放，视野广大，是不同文化、文明的沟通者、启蒙者。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面向未来的努力。南方科技大学致力于打造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新锐科幻作家刘洋的《火星孤儿》《单孔衍射》及吴岩的儿童科幻作品《中国轨道号》等作正在成为文学的新景观，启发读者探向更高处、更远处、更幽深处。

如果说特区赐予深圳这片土地以不同的初速度，那么大湾区将给予它更为神奇的增速度，甚至是几何倍增。我知道已有很多深圳作家作品获得过国际国内多种重要的奖项，但我仍愿意将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蔡东的《月光下》视为深圳小说的一个新起点。自《往生》起，蔡东因轻盈而诗性的风格书写现实的滞重、晦暗获得多方美誉。虽然蔡东在叙事格局上尚可进一步打开，但她始终不懈地探寻现代城市美学，在深圳发现留州，在大时代中坚持小生活。颁奖词认为《月光下》“映照人的疏离与亲情，古老的诗意图转化为现代经验的内在光亮”。我相信，现代感与古典神韵交织的“月光下”会给都市文学提供浪漫的启示。

预感盛唐气象的来临，诗人王湾写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随着大湾区魅力的不断提升，深圳文学亦将再出发，前景如海，万物花开。

安凉《天空有朵吉祥的云》

琐碎日常中的人性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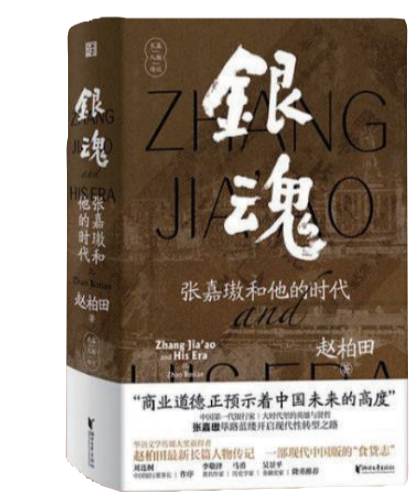
□黄小邨

安凉的小说《天空有朵吉祥的云》（载《北京文学》2022年10期）会让人想起自己的生命中出现过的那些痛苦、混乱甚至恐惧的时刻。小说的背景发生在那种曲里拐弯、人心叵测的大城市的老小区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横祸，打破了小区的秩序和宁静，一块不知从何而来的肥皂砸中了一位老太的头颅，直接将她送进了医院ICU。一时间小区单元楼成了个大戏台，以802室刘阿姨，1002室婊阿姨等为首的一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走台步、做姿态、吊嗓子，嬉笑怒骂、指桑骂槐。台下的观众费老师看得目瞪口呆，甚至有点避之不及。直到他发现自己才是这场事故的始作俑者。

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里写道：“英雄就是能够战胜个人与当地历史局限性的男人或女人。”而这些局限针对的是普遍有效的常规人类模式。在现代生活中，那些征战天下、拯救人类的史诗之中的英雄或许不再，但是作为一个不朽的人——那种在磨难之中克服了自身局限，突破了现实种种“无物之阵”束缚的人，由他们呈现出来的那种更加完美的、高贵的人格更接近于现代社会的英雄主义道成肉身。费老师在汹涌的舆情和邻里剑拔弩张的对立之中，也曾经迟疑动摇过，但正如《千面英雄》所写道的，“英雄历尽艰险寻找并赢得的神圣力量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的神圣与救赎的神圣形象的象征，只是等待我们去认识，使它呈现出生命而已。救赎费老师的梦境中父亲的那个关于“诚实”的故事，那是一道道德的反光镜，让他在复杂幽暗、日夜躁动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了一种非常高贵、但又不是神化的人性正能量，并在它的指引下找到真正的吉祥之云。古人认为，君子心意发动即有光辉，他们往往能以温柔敦厚的心灵压制邪恶邪念，其意向光明所以有光辉显耀。光辉都是吉祥的，能带给人们好运，这正是吉祥之云的母题意象。

王安忆说过：“理想的最大敌人根本不是理想的实现所遇到的挫折、障碍，而是平庸、琐碎、卑微的日常事务。”在那些日常事务的中间，理想往往会变得非常可笑，有理想的人反而变得非正常，甚至于病态，而庸常才是正常的。高空抛物本身就是个悬念，费老师从来没有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块肥皂的下滑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意外，而他也将面对副校长的公示，这样的考验，被作者以绵密诚恳的笔调娓娓道来，如此琐碎，如此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事实上，文学的魅力从来不在于大江大海的情绪宣泄，更在于它于幽微丰富的思辨与想象的能量，如一朵喷薄而出、玄机无限的云，在字里行间开拓出无限解读诠释的可能。

我看见他走在历史的崇山峻岭中



□孙小宇

处境的细微体察仍体现于这种叙述张力之中，这充分说明，他是能穿透这些无形而庞大的资料之墙的，我想这应该是他进入银行系统增长的功力。

柏田老师的《南华录》《赫德的情人》与《枪炮与货币》我都做过访谈，如果说，在面对《赫德的情人》这样拿历史做小说想象的文本时，我是努力绕到后面，挖掘文本A之外的历史B面。那么到了这本《银魂》，我觉得就是与历史B面正面迎上。

通过这部作品，我觉得柏田老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策略。从前那个喜欢卡尔维诺轻逸叙述的写作者，仿佛脱胎换骨，我甚至觉得，他是把那些明显属于银行家之长、文科大脑之短的枯燥数字、经济原理，也当一种巨大的存在物在凝视，并且领悟它们密集分布于书中的意义。

关于柏田老师写作过程中的张嘉璈，因应于现实的需要，我也曾请柏田老师根据版面，截取过几个人生片段。这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柏田老师的写作，是能和现实对话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困境与精神困境，要破局，也许要掉过头向后看。我相信，柏田先生今后的创作，依旧会替我们寻找答案，在他已经走人的历史的崇山峻岭中。

当我们回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版图，其中深圳具有甚为特殊的意义。深圳是广东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转型的示范性窗口，这也必然影响到了诗歌创作的整体环境以及诗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而影响到诗人的心态以及日常生活。从时间序列上看，深圳诗歌构成了一个阶段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深圳诗歌是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探索、发展以及时代嬗变相同步的文学形态，在频频共振中诗人积极地回应“特区经验”，积极地呼应时代、城市、工业、诗学以及人的多重命题。

在深圳这座城市，多元化的诗歌潮流、繁复形态的诗歌样本以及写作者所携带的区域身份、地方文化在40多年来引发文化界的持续关注。无论是最初的现代诗群、城市诗歌、打工诗歌还是晚近时期的新移民诗歌、新都市诗歌、新工业诗歌，无论是诗歌刊物（包括民刊）、整体生态还是在诗歌与城市空间、大众文化以及新媒体革命的积极互动上，深圳都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崭新样本和诗歌经验。

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新时代的最初发生都亟须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而诗人正是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1980年代初谭日超等人的长诗《望香港》与1997年关飞、晓麟、程学源、林晓东等四人创作的长诗《百年期待》就呈现了这一总体性视野中诗人的历史感和现实精神，这也是新时期以来深圳长篇政治抒情诗的收获。

1986年是深圳诗歌必将载入史册的重要一年。是年10月，时任《深圳青年报》副刊编辑的徐敬亚带动吕贵品等深圳青年诗人在全国发起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几百个诗歌流派迅速宣告诞生，轰轰烈烈的青年诗群以及实验性写作行动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自此，深圳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重心，其对调整当代诗歌的写作格局和发展趋向起到了积极作用。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谢湘南的诗集《深圳时间：一个深圳诗人的成长轨迹》印证了在40多年间身份殊异、风格迥异的诗人积极参与了深圳的文化建设。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深圳人”又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见证者，他们的写作自然带有了个体成长史与整体性“诗史”相融合的特征。从“主题学”或“类型化”视野来进入这40多年的深圳诗歌，我们会发现“深圳诗歌”已经成为社会学和文学史意义上的专有名词，与之相关的诗歌潮流、现象、文本、刊物以及生存背景及时代场域在诗学和文学的两个维度打开，人性、诗性与精神史、社会史彼此交织，个人与时代深度互动、对话、融合。

时代在变，诗歌主题也在变，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90年代以来，随着大批打工者的涌入以及深圳工业、产业的发展，“打工诗歌”（“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底层写作”）成为重要的创作潮流与文化现象，互联网平台以及各种民刊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深圳，谢湘南、郭金牛、程鹏、许立志、蒋志武等不同代际的一大批打工诗人接连涌现，大量诗歌都与“城市”“工业”“铁”“机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乡土”“原乡”有着密切关联。显然，他们的诗歌也在个人际遇、生命体验、心灵史与流水线生产和现代性工业文明的对话中激活了人性之力与人文之光。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深圳诗人已不单是携带“过敏史”的“个体”，而是转换为“社会样本”“文化符号”“时代寓言”以及“阶层发声者”。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们经由厂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城市圈层以及物流交通网络看到了庞大而多变的社会场域以及新工业和全球制造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日新月异的城市空间、后工业景观以及速度化的现代性场域折射出复杂的现代性经验、工业文明机制、城市格局、生态文明以及时代心理的嬗变。由此，诗人必须具有强大消化能力的胃来处理当代的新题材、新主题和新经验。

从诗歌传播和媒介革命来看，从最初BBS论坛、电子诗刊、诗歌网站到后来的博客、微博、微信、APP以及各种短视频直播，强社交媒体和电子化诗歌阅读的景观时代已经到来。深圳诗歌积极参与媒介革命和传播新变，散布在深圳各个区、街道以及工厂、高校的诗人社群以及《特区文学·诗》《边缘》《深圳诗人》《深圳诗刊》《诗深圳》《深圳诗歌》《大家诗志》《飞地》《白诗歌》《羊台山》《打铁》《好汉坡诗刊》《诗南方》《诗艺》《诗篇》《中国诗坛》等刊物在积极推动深圳诗群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相应，诗人创作心态、诗歌样式、生产方式、生产机制以及诗歌秩序、文体边界、诗学体系、整体面貌都发生变化。深圳诗歌与音乐、影视、戏剧、现代舞、绘画、书法以及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诸多领域发生了交互，诗歌的剧场化、大众化、公共化的跨界传播现象非常普遍。以“第一朗读者·诗剧场”“诗歌人间”以及“诗歌与孩子”等为代表的诗歌活动在积极探索诗歌跨界以及诗教、传播的新途径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简言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圳诗歌的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和大众化的特征，诗歌介入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徐敬亚、吕贵品、孙文波、刘虹、孙夜、菜耳、从容、谢湘南、张尔、安石榴、潘漠子、阿翔、樊子、远人、远洋、朱巧玲、田地、苇白、吕布布、郭金牛、余文波、宝兰、唐成茂、蒋志武、李鬼、李双鱼、宋墨田、赵目珍、何鸣等诗人已有多样的诗歌创作自由与实践呈现出多元、繁复的写作景观，体现了诗人的自由意志与深沉的思辨能力，也体现出差异性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以及修辞上的求真意志。

总而言之，40多年来的深圳诗歌在“改革开放”“城市文化”和“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繁荣、多元、新变、共生、创造是其发展的关键词。40多年的“深圳诗歌”经验也有力印证了诗人既是“社会公民”“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自主性和社会性的异质混成结构，也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我们也期待着深圳诗歌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能够继续创造出属于自身的传统，期待着深圳诗歌在美学创设、读者接受、公共文化空间拓展以及“世界诗歌”传播视野中获得进一步的影响力和共识度。

「深圳诗歌」：样态、经验与启示

——深圳诗歌（1980—2022）创作概述

□霍俊明